

理论探讨

"方证对应"研究的思考

窦志芳¹ 郭 蕾² 张俊龙² 张 鑫¹

摘要 "方证对应"强调有是证用是方,是用以探讨临床处方用药应用规律的方法之一,起源于《伤寒论》,经过历代医家的发挥与实践,渐趋成熟和完善。随着中医药现代化研究的不断深入,运用现代医学、生物学、电子信息技术等多种新学科方法进行中医药研究成为重要趋势,分析总结了"方证对应"研究的历史与现状,提出应该将数据挖掘技术引入方证对应研究,以期揭示方与证之间的规律,为提高临床水平服务。

主题词 方剂 证候 @ 方证对应

Thinking about Studies on "Correspondence between Recipe and Syndrome"

Dou Zhifang¹, Guo Lei², Zhang Junlong², et al.

(1. Shandong University of TCM, Ji'nan 250014, Shandong Province; 2. Department of Postgraduate Students, Shanxi College of TCM)

Abstract Theory of "correspondence between recipe and syndrome" emphasizes a certain recipe for treatment of a certain syndrome. It is a method for studying application rules of drugs in clinical recipes, originating from Treatise on Fevers, and gradually matures and perfects through elaboration and practice of medical experts of past ages. Along with modern studies on Chinese medicine going into deep, application of modern medicine, biology, electric information technique and other methods to studies on TCM have become an important tendency. The present paper summarizes history and present situation of the studies on "correspondence between recipe and syndrome", and puts forward that data-excavating technique should be led into the studies of "correspondence between recipe and syndrome", so as to reveal the rules between recipe and syndrome and improve clinical levels.

Key Words Prescription; Syndromes; @ Correspondence between recipe and syndrome

"方证对应"理论产生于对方证对应变化规律的研究与实践,自仲景开创以来,在诸多医家尤其是伤寒家的发挥和实践下,逐步发展成为一门相对独立的学说。但是长期以来,对于"方证对应"的研究仍以动物实验、临床观察为主,缺乏多学科知识的运用。运用数据挖掘方法,从"方证对应"入手,深入研究某一方与某一证的特定对应关系,可以明确地认识或揭示该证的病变实质,阐明该方治疗该证的功效实质,可以按"方证对应"规律把证候、病机、治法、组方、疗效评价等融为一体,形成一种特定的"方证对应"综合体系。

1 "方证对应"研究的回顾

1.1 "方证对应"的含义:"方"不仅是指药物的特定组合,而且指具有明确应用指征的药物^[1]。"证"这里指证候,指对四诊信息表达的机体病理生理变化整体反应状态的概括,具有内实外虚,动态时空,多维界面的表现特征^[2]。"对应"指一系统中某一项在性质、作用、位置、数量上跟另一系统中某一项相当^[3]。"方证对应"指在治疗疾病时所选用的方必须与证候相对应,有是证

用是方,方随证立,证变则方变。

1.2 "方证对应"的理论渊源:"方证对应"源于《伤寒论》,研究《伤寒论》会发现,书中 113 方都是"证以方名,方由证立",方证一体的形式表述。论中所言"柴胡证"、"桂枝证",即是以方名证,是方证对应理论的主要组成部分。唐代孙思邈正式提出"方证对应"理论,并采用"方证同条,比类相附"的方法进行研究,以使方随证立,证随方呈。宋代朱肱是"方证对应"理论的极力拥护者,将"方证"简称为"药证",提出"所谓药证者,药方前有证也,如某方治某病是也……"。明清以来,"方证对应"被越来越多的人所赞同,喻嘉言将"方证对应"解释为"有是病即是有是药,见此症便与此方,是仲景活法"。《伤寒来苏集》中运用"以方类证,以方名证,方不拘经",大大丰富和发展了方证对应理论。还有的医家以具体方证为纲,进行方证研究,如柯琴全书列桂枝、麻黄、柴胡等汤证 30 余种,统辖仲景百余方治。徐大椿将 113 方进一步归类于桂枝汤、麻黄汤、葛根汤等 12 类,各类方证中,先出主方,随以论中用此方之证列于方后,成为以方类证,证从方治的"方证对应"学说。随着中医学在日本的流传,"方证对应"理论也引起了日本医家的重视,吉益东洞在其《类聚方》中提出了按方

基金项目: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科学技术研究专项(04-05JP10)

1 山东中医药大学山东省济南市经二路 53 号(250014)

2 山西中医学院研究生部

收稿日期:2006-01-27

类证,定方定证,多方合用的治疗原则,使方证对应的传统诊疗原则更具有科学性和客观性。近现代“方证对应”理论也一直指导着中医临床的选方用药,随着人们对这一理论的认识的不断深入,有学者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新的辨证方法——方剂辨证。

2 “方证对应”研究的现实意义

2.1 深化方剂配伍与应用研究:中医药方剂配伍规律是中医药理论的特色和精华,开展中医方剂配伍规律研究是中医药现代化研究的重要内容之一。对方剂配伍的研究,大多医家以研究药物间的君、臣、佐、使,七情合和,气味组合,升降相因为主。于友华等^[1]指出:在方剂配伍研究的总体思路上,应遵从“病证结合、方证对应、理法方药统一”的指导思想。由于方剂的形成涉及到中药与中医药理论,方剂的组成涉及到理、法、方、药,方剂的疗效涉及到中药配伍以及方剂作用的体内外环境,因此,方剂的配伍规律研究需要在中医药理论指导下进行研究。自古方不离证,证不离方,以方识证,以方测证,从方剂配伍与方剂应用的相关性研究入手,探讨方与证之间的相应模式及变化规律,通过方剂与证候间接地认识方剂的功效和作用机理。

2.2 指导中医临床选方与用药:“方证对应”是中医临证选方的重要原则之一,是方剂发挥临床疗效的关键所在,也是准确有效地运用成方的一条捷径。证候具有动态变化的特点,因此,在临证时要根据证候变化及配伍规律而加减变化,针对不同证候,不同病机,选对应方剂或配伍新方,求得方证的最佳对应。每一方对应和契合的相对稳定的证。古方今方并无优劣之分,只要与证候相合即可用此方来治疗。如见到“汗出”,“脉浮”,“恶风”,“头痛”,“发热”,此类证候则可用桂枝汤治疗。“方证对应”的研究有助于增强临床工作者对方证的识别能力,规范其诊断和治疗的临床操作过程,使“方证对应”这一指导原则更容易被掌握和运用。

2.3 避免中药新药开发领域的盲目重复:中医药为中华民族的繁衍生息、为人民群众的生命健康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并在逐步改进提高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中医药以其独特的整体观念和辨证论治的治疗模式,以及中药所特有的低毒性、疗效确切、非耐药特性、整体调节及双向调节效应等在医疗康复保健方面的独特优势,越来越受到各国人民的重视和欢迎。但是现在中药新药的开发上存在着诸如无创新的低水平重复,对所谓新指标的盲目套用等缺陷,这些都严重制约了中药新药的开发与研究。中药的开发,不能离开中医理论。从方与证之间的联系性和规律性出发,通过多种方证对应模式的研究,筛选出针对性强,应用指征明确,疗

效显著的方剂或药物进行新药开发,可以避免新药开发领域出现的盲目、重复现象。不仅可以有效地利用中药资源,而且可以为保障人民健康做贡献。

3 将数据挖掘技术引入“方证对应”研究

数据挖掘(Data Mining)技术是人们长期对数据库技术研究和开发的结果,汇聚了数据库技术、人工智能和数理统计等学科的最新研究成果,以庞大复杂的数据为对象,通过对数量巨大,内容复杂的数据进行组织处理、分析、结合和解释,自动地将数据转换为信息,发掘数据内在联系,揭示数据所反映的客观规律,预测发展趋势。

3.1 数据挖掘引入的可行性:(1)数据挖掘方法创立于1989年,经过10多年的发展,其相关性技术和方法如决策树、人工神经网络、关联规则等已基本成熟,已成功运用于金融、化学和生物学等领域,并开始应用于医学领域,如揭示基因与蛋白质间的复杂联系,通过对生物医学数据的智能分析建立临床决策支持系统等。因此,在“方证对应”研究中引入数据挖掘是完全可能的。(2)数据挖掘针对的是海量信息,而“方证对应”学说自东汉以来,经过了历代医家的发挥和实践,积累了大量的事实性数据,完全可以满足数据挖掘的需要,加之现代高效、快捷的信息手段为全面、系统的文献获取提供了保障。国际Cochrane协作网、中国生物医学文献光盘数据库(CBMdisc)、中国Cochrane中心临床对照实验资料数据库(CCTR)、中文期刊网全文数据库、中文科技期刊中医学文献索引等资源更进一步保证了资料获取的全面性、可靠性。(3)国内外循证医学的研究成就为临床资料的选评提供了切实可行的方法,相关机构(如华西医院Cochrane协作中心、中国中医科学院临床评价中心等)使专家咨询环节得以实现,保证了证据资料分级的正确性和良好的应用性。(4)迅猛发展的数据挖掘研究已经开发出很多较为成熟的技术和方法,为研究的顺利进行提供了必要的技术支撑。

3.2 创新性:数据挖掘技术和方法在揭示基因与蛋白质之间和复杂联系中取得显著成绩,但是在中医药领域的应用报道较为鲜见。鉴于方证相关临床报道数据的海量,应尝试将数据挖掘引入“方证对应”研究中,揭示方剂与证候之间的对应的关系。“方证对应”理论以“方为证立”,“方随证转”为主要观点,但方剂组成和药物间及方证关系间具有多层次,多交叉和动态变化性,其研究内容非常复杂,通过使用动物实验无法完成整方研究及拆方研究,而数据挖掘可以采取多种算法来适应不同需求,解决动物实验难以解决的问题。数据挖

(下转第570页)

提炼其要点之后再做分析:明代韩忭在《韩氏医通》中所叙的“书案六要”,是书写医案的要点,也是读案的要点,他说:“一书某年某月某人;二书其人年之高下,形之肥瘦长短,色之黑白枯润,声之清浊长短;三书其人苦乐病由,始于何日;四书初时病证,服某药,次服某药,再服某药,某药少效,某药不效;五书时下昼夜孰甚,寒多热多,喜恶何物,脉之三部九候如何?亦引经旨以定病名,某证为标,某证为本,某证为急当先治,某证为缓当后治,某脏当补,某脏当泻;六书用某药,加減某药,某药补某脏,某药泻某脏,君臣佐使之理,吐下汗之意一一详尽,末书某郡医生某撰。”韩氏的书案要点,也正体现了辨证论治的要点,可作为读案的纲领。

3.3 学习案主如何利用规范和前人经验:规范有易用性,把患者的具体情况与规范对号入座,以对上号者乃从其法其方,当是辨证论治的基本方法,《灵枢·逆顺肥瘦》称此为“法式检押”。《伤寒论》、《金匱要略》以及各名家的名著在临床被视为规范,古代医家重视规范,有些作者认为自己著作有规范价值,以此意名书,如王肯堂《证治准绳》、江涵暾《笔花医镜》、徐大椿《兰台轨范》等。现代中医已有统编的教科书及国家颁布的各科辨证论治规范。运用规范是辨证论治的基本功,近代经方大师曹颖甫,将其医案称《经方实验录》,表明他以经方为规范和对仲景的尊重。

3.4 探寻医案中关于病情的新发现和治疗的创新之处:医案的精髓就是案主的新发现和在治疗时运用新思路、新方法、方药的妙用。尤其应当注视其中运用套路进行辨证论治的思维方法。医案的价值在此。

3.5 训练分析方剂和加減用药的能力:如果是用药物治疗,其治法体现于用方,何以用此方?特别是对妙用成方者尤其应该求其机理,对有加減者应知为何有此加減。在研究古代文献时,有“以方测证”之法,但并非尽然,例如四逆散治少阴厥逆就不是从药物分析能说

清的。《伤寒论》中有阳明三急下证、少阴三急下证,都无痞、满、燥、实、坚的指征,但用承气则意在急下存阴。但方剂与脉证互训才能增长临床经验。因此,在读案时还要配合其他书籍共读才是。

3.6 运用比较法、归纳法阅读医案:把治某一病证的几个名家医案比较一读,可知其辨证论治的共同规律,又可知诸个名家的风格。例如治痹证,不外乎温阳祛风、化湿活血、虫类搜剔,但章次公以擅用虫药著称。又如读《临证指南医案》结合其他人的医案可知,叶桂论中风是在东垣气虚说、丹溪湿痰说、缪仲淳内风说的基础上创造性地提出了肝阳化风说,这也为中风证治开辟了新思路。

3.7 重视误诊医案:医生的经验甚至是由患者鲜血乃至生命换来的,再现概率极小,失败的经验比成功经验更有价值,其教训更珍贵。作者本着对工作负责、关爱众生的精神,留下这类可贵资料,非常值得重视。这类医案多散在于医案集之中,清代有佚名作者编著《复辄记》,未见著录。

3.8 现代人应多读现代医案:现代中医学处于转型时期,其名词术语、药物计量单位、治疗范畴乃至临床规范、思维方式都与古代有差异,包括运用现代医学病名,吸收了理化检查资料,同时,现代病案的写法,也演变为病历式医案,以全面清晰称著,贴近现实,最为实用。应从科学发展观审视当代中医学的进展。现代中医临床报道重视群案分析,固然可以提升对总规律的认识,但往往又冲淡了各案中案主的特殊经验及其人辨证论治的艺术性。故从学术发展来看对群案与个案要同等重视才行。值得思考的是,作为个案集合的群案,其个案都是在疾病不确定性理念的意识下辨证论治,那么它们集合的离散度非常之大,其概括结论的可重复性势必不高。既然研读医案是理论联系实践的钥匙,那么研读现代人的医案则是理论联系现代实践的钥匙,笔者以此提倡现代中医多读现代医案。

(上接第564页)

掘不是孤立的,而是与其他方法相辅相成的,数据挖掘要利用其他方法所提供准确可靠足够数量的数据,其数据量越大,挖掘结果越可信。反过来,数据挖掘同时又可为临床和实验研究提供重要的研究线索和思路。

综上所述,在“方证对应”研究中,既要重视临床和实验研究的分析和总结,又要利用数据挖掘技术分析既以存在的大量数据来揭示证候的功效实质和方剂的功效实质,并把这种特异性对应关系发展为包括证候实质、异病同证的证候诊断标准,方剂对疾病的疗效评

价标准,方剂对证候的疗效评价标准,证候与方剂之间的线性和非线性映射关系与对应模式的一种“方证对应”体系。

参考文献

- 1 黄煌.论方证相关及其意义.中国中医基础医学杂志,1998,4(6):11.
- 2 郭蕾,王永炎,张志斌.证候概念的诠释.北京中医药大学学报,2003,26(2):5~8.
- 3 周训伦,罗琴.方证对应规律与方法探讨.成都中医药大学学报,1995,18(1):1.
- 4 于友华,王永炎,赵宜军,等.方剂配伍规律的研究.中国中药杂志,2001,26(4):219.